

親 共 投 共 萬 事 皆 空

戲 說 劉 文 輝 終 篇

● 巴 山

長期受中共的影響

劉文輝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聯合鄧錫侯、潘文華，在四川彭縣通電起義，投誠共軍，絕不是一件偶然事件。這是劉文輝長期受中共的影響，發展到最後投共，其間經歷了數十年的演變。

劉文輝幼年讀孔孟之書，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青年時期，當他進入保定軍校後，對西方新學有所接觸，後又經「五四」運動、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的洗禮，從而使他在思想上接受了不少的「現實主義」，有了傾向革命的思想萌芽和表露；當然，這是一種「不自覺」的表現。

中共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在上海宣告成立之後，在各地均成立了中共組織。四川是一九二三年成立的，當時的領導人是王右木、楊闇公、吳玉章等人。他們在四川組織農工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活動；同時在川軍中著重開展工作，進行接觸，增強「共識」。後來，朱德、陳毅、劉伯承等著名川籍人士就發動了順瀘起義，配合了北伐運動。

正當北伐時期，劉文輝在政治上正是頂盛時期，擁師十萬兵眾，佔據了四川大半個地盤。當時劉意滿志得，傲視一切，認為「天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大有稱霸四川和西南的野心。為此，中共認為劉文輝這個人，在川軍中是一個核心人物，要把著眼點放在劉的身上，爭取在各種政治力量的夾逢中求生存。

一九二六年，正是北伐軍興起，在全民族為推翻封建主義、求民主求前進潮流的感染下，劉文輝邀請了當時四川的中共領導人劉願庵為他的高級顧問，中共黨員李靜軒（劉文輝的保定同學）為他的秘書長。

在這些共產黨人的影響下，一九二六年八月，劉文輝表示邀請吳玉章主持成都大學，並表示「願意出資辦一報」，還要求劉願庵派人到他軍隊中做政治工作。這都是劉文輝接受了孫中山先生改組中國國民黨、制定三大政策、實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結果。

在北伐時期，他受劉湘之意，與賴心輝、劉成勳發出討伐吳佩孚的通電，並表示願意出師北伐。十月十日，北伐軍佔領武昌後，劉文輝派一

代表團前往武漢活動，代表團團長是劉文輝的保定系的親信張志和。代表團到武漢後，找到了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通過鄧演達向蔣中正提議任命劉文輝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軍長。同時，代表團在武漢選結識了著名共產黨人董必武、吳玉章、李立三、張左雷等人。爾後，中共四川領導人劉願庵策動二十四軍軍部副官處處長李鐵夫與任劍若、張子玉創辦國民書店，永寧書店，推售進步書刊；又策動李鐵夫與李靜軒、鍾善輔等創辦《革命日報》、《工友》等刊物，經費由劉文輝開支。同時，劉文輝還送一筆錢給劉願庵，讓他辦《星火旬刊》，此刊物主要宣傳中共思想。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劉文輝同唐生智聯名通電反對蔣中正總司令，次年的七月十二日，又同汪精衛、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聯合共同反對蔣中正任主席的南京國民政府。

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夏的軍閥混戰，劉文輝被堂侄劉湘、鄧錫侯、田頌堯聯軍擊敗，退守雅安。由於劉湘的態度和當時的情勢，迫使劉文輝思想進一步親共。

張瀾介紹加入民盟

劉文輝在《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一文中有這麼一段話：「反蔣失敗，轉而親共，親共之後，繼續反蔣，這是在解放前一個較長時期內的政治活動的基本內容。我的反蔣不是爲了革命，而是基於個人的政治野心。同樣我的親共也不是爲了革命，而是基於政治上的利害。」他又說：「我同中共的正式接觸，始於一九三八年，即抗日戰爭發生後的第二年。」

一九三八年四月漢口淪陷前，劉文輝因西康省事赴漢口見蔣中正委員長。周恩來派吳玉章在漢口江漢路四明銀行四樓與劉文輝進行密談。密談後，劉文輝很受感動，他向吳玉章表示，要爲自己的政治生命開創新的「轉機」。

一九三八年夏季，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陳紹禹（王明）由陝北去漢口參加國民參政會會議，取道成都。在成都方正街劉文輝的寓所與劉文輝正式會晤。劉文輝贊賞中共抗日主張；劉文輝表示要繼續反蔣，擁護中共的抗日方針，並說通過這次正式接觸與中共間產生了共識，爲他親共開闢了一條「坦途」。

一九三九年夏天，中共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飛在重慶曾家巖潘文華家裏與劉文輝進行了第二次接觸。事後，劉文輝明確表示爲抗日戰爭的勝利產生了信心。

一九四一年，中共通過一些高層知識界人士，在成都洛陽路組成「唯民社」，其宗旨是：「民族團結，堅持抗日，反對獨裁，實行民主」；

在這樣一個秘密性的政治組織中，劉文輝自任社長，公然表示「願意承擔這一重任。」

一九四二年二月，周恩來在重慶機場街關晉航家中第一次單獨會見了劉文輝。會見後，劉文輝說：「周恩來與他的談話，使他明確了政治方向，增強了前進力量。」從此，劉文輝同中共的關係，也就由一般的聯繫，進入到實際配合的階段。

一九四二年六月，周恩來爲了爭取地方軍隊團結抗日，保持共產黨與友軍的聯繫，決定派王少春到劉文輝二十四軍設立電臺，由延安中共電臺直接與劉文輝聯繫。劉文輝後來說：「這部電臺經歷近八年而沒有被破壞。」

一九四三年周恩來在重慶大官府街郭沫若公寓召開會議，加強川康地區的團結，並強調加強川軍間的團結更爲重要。是年六、七月間，劉文輝兩次派二十四軍參謀長楊家楨到重慶同王若飛會晤；會晤的內容由楊家楨向劉文輝傳達。一九四四年六、七月間，劉文輝在重慶潘文華公寓同王若飛會晤；年冬，經張瀾介紹，劉文輝和潘文華秘密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

一九四五年二月，中共重慶工委派張友漁到成都爭取劉文輝。張友漁在劉文輝公寓住了一個月的時間，每天給劉文輝講國內外形勢和共黨理論，並解答劉文輝的一些疑慮。後來，劉文輝自稱：「我等於進了一次政治學校。」

暗作準備重新部署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軍投降後，由於國共兩黨

的嚴重分歧，「內戰」即將爆發。一九四六年王若飛在重慶曾家巖召見劉文輝參謀長楊家楨，王若飛說：「共產黨重視與劉文輝的關係，我們對劉文輝是抱有希望的；希望他能同我們一道前進。」

一九四六年春，蔣中正主席在重慶找劉文輝談話。周恩來知道後，當晚在重慶機場街吳晉航家對劉文輝說：「局勢如何演變，鬥爭總是不可避免的。」十一月，劉文輝赴南京開會，聽了蔣中正的講話，劉感到中國的內戰即將爆發，他很耽心，思想上有各種疑慮。周恩來在離開南京前夕對劉文輝說：你回去後要好好搞，你將來是有前途的。劉文輝回西康後，按照周恩來的建議，他發表了「今天的時代是民主時代」的講話，受到了劉自己轄區軍民的好評。

一九四七年初，國共談判破裂。三月，中共設在重慶的辦事處已無法工作，只好撤走。不久即爆發了內戰，蔣中正頒發了在國統區實行「戡亂動員令」；而劉文輝管轄的西康省卻沒有跟著蔣中正做。爲此，不少中共黨員和上層知名人士從四川撤到西康，人稱雅安是「小香港」。對此，蔣中正大爲不滿，說要查辦劉文輝。

一九四八年春，蔣中正命令二十四軍出兵「剿匪」；劉文輝強調西康邊防重要、兵力又分散難於調動爲由，給蔣中正回電稱：「當中原鼎沸之際，正邊陲擾攘之秋，康防本已空虛，藏軍正伺隙而動，如再把二十四軍抽走，勢必釀成巨變，不可收拾。邊防緊急，請免調二十四軍。」以此拒絕了蔣中正的命令。劉文輝的二十四軍始終

未出一兵一卒參加內戰，深獲中共好感。

一九四八年，是中共奪取政權的關鍵性一年。在這年裏，相繼進行了遼瀋、淮海、平津三天戰役。劉文輝讀到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時，十分激動地說：「幾十年來，我接觸過各種政治力量的首腦人物，也讀過孫中山的不少文章，從未見過像毛澤東把局勢分析得這樣深透的論述。中共有這樣英明的領袖，怎麼能不成功呢？」

一九四八年冬，劉文輝認為蔣中正的敗局已定，無可挽回；認為這也是投共的好機會並積極進行投共的一切準備。

一九四九年元旦，蔣中正發表聲明向中共求和。次日，張群從南京發來一電，約劉文輝到南京一談。一月五日，劉文輝飛南京，看到南京城內一片兵慌馬亂的景象。蔣中正要張群注意爭取說服劉文輝，要劉穩住四川。在南京的十天裏，蔣中正和張群數次找劉文輝談話，蔣對劉文輝極力表示好感，特派空軍專機送劉文輝回成都。當劉文輝回到成都，並未按蔣中正講的辦，而是加緊準備迎接共軍。

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西安、武漢被共軍解放；湖南程潛準備投共；戰事的重心轉到西南方面。在形勢急劇變化的情況下，劉文輝為了表明他對中共的誠意，特向周恩來發電稱：「一年來受蔣壓迫，積怒難言；以處境困難，只得暗作準備。今已與鄧錫侯約好，決定投向人民。今後應如何行動，請予指示。」劉文輝這份電報，明明白白的表明了他決心投共。周恩來接到劉文輝的電

報後，知道了他的決心，馬上給劉文輝回電：「

大軍不日西指，希積極準備，相機配合；不宜過早行動，招致不必要損失」。由於蔣中正對劉文輝素不放心，怕蔣在緊要時刻對劉文輝採取不利行動，在一九四八年九月月上旬，中共又派人在成都與劉文輝會晤，商定了劉文輝與共軍配合阻擊胡宗南南退的行動方案：

(一)如胡宗南部在陝西被共軍擊潰時向川康方向撤退，劉文輝部應切斷其退路，配合共軍給予消滅；

(二)如胡宗南部被共軍壓迫，自動向川康方向撤退，共軍在後面尾追時，劉文輝部應阻止其退卻，配合共軍給予殲滅；

(三)如胡宗南部未被共軍壓迫，自動向川康方向撤退時，劉文輝部應獨立行動，以牽制、擾亂的方法，阻止胡部佔領和鞏固西康，以待共軍到達消滅之；

(四)在現階段，應利用封建外衣充實民主內容；並在物質上、精神上做好配合共軍作戰的準備。

以上四條，就是劉文輝準備投共的具體實施辦法；但就在同一時期，胡宗南曾一再向蔣中正建議：在他南退時應首先以武力解決劉文輝部，然後佔領西康，消除隱患。同時，王陵基更擬了一個佔領西康的具體計劃：準備先在邛崃、名山製造一次騷亂，然後以平息動亂為名，將保安部隊及駐防新津的一〇四師傅秉勛部開到名山、邛崃地區，乘勢襲擊雅安，把劉文輝消滅，控制西康，併報告了蔣中正審批。蔣卻認為，如果那樣

做，會打亂他的計劃而未予批准。

然而蔣中正正是採取「調虎離山」的辦法，將劉文輝調離西康，準備任命劉文輝為川康綏靖公署主任（新成立），綑住劉的手腳，而以賀國光或向傳義接任劉文輝的西康省主席。

劉文輝知道上述情況後，在雅安，對西康全省的軍事、政治重新作了部署，於十月下旬到成都找鄧錫侯、潘文華、熊克武、鄧漢祥等人面商應變對策。

劉文輝拒絕飛台灣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共軍二野主力和一、四野一部，兵分東、北兩路向西南進軍。十一月三十日重慶被共軍佔領，蔣中正飛抵成都。當日下午蔣在成都北較場成都中央軍校校部召集張群、鄧錫侯、熊克武、向傳義、王陵基、王纘緒和劉文輝等談話，要劉文輝和王陵基死守成都。第二天，張群通過鄧漢祥向劉文輝提出兩條意見：一是要劉文輝同鄧錫侯和胡宗南合署辦公，一起指揮作戰；二是要劉文輝和鄧錫侯的家眷同熊克武、向傳義、鄧漢祥等先去臺灣。劉文輝很明白張群的意思，就是無非要把家眷作為「人質」而已。十二月四日晚間，國民黨財政部長關吉玉送給劉文輝五萬元外匯，作為劉文輝家眷去臺灣的費用而被劉拒絕。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蔣中正約劉文輝和鄧錫侯於午後四時到北較場談話；劉認為此去兇多吉少，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因此，他馬上找鄧錫侯商量，決定當日下午一時離開

成都出走，按預定方案集合；九日到了彭縣，十日潘文華由灌縣也趕到當地。三人會面後立即開會準備起義。十二月七日劉文輝離開成都時就派副官將擬於九日起義的電稿送往雅安；二十一日由王少春發給毛澤東、朱德宣布起義。

由於劉文輝的出走，蔣中正感到不妙，怕再來一個「西安事變」，於十二月十日匆忙飛往臺灣。

商討對策沿線設防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在彭縣宣布起義後，十二月十二日駐西昌、康定和雅安的劉文輝下屬部隊同時宣佈起義。十二月十三日宣佈成立西康臨時軍政委員會，劉文輝任主席，他的侄兒劉元瑄任副主席。

劉文輝起義後，為防止胡宗南南進計劃，劉和他的親信們急忙商討對策並在成都沿線設防、阻擊胡宗南的作戰方案：

(一) 一三七師特務營駐成都外南之特務團團長董旭坤營（後改稱團），堅守武侯祠，任務是保護華西大學。

(二) 一三六師周桂山團長兼陳明揚團駐雙流部隊第二營長。其任務是阻擊胡宗南部隊，如無力阻擊便撤回邛崃。

(三) 一三六師副師長兼團長陳明揚指揮該團在雙流、新津、邛崃等地阻擊胡宗南部隊南下，務在邛崃南河右岸高地佈防，如遇胡宗南部重兵南壓吃不住時，便撤至邛崃。

(四) 一三七師副師長兼團長毛國懋在邛崃、眉

山之間的黑竹關、百丈等地阻擊胡部，為二十四軍之第二道防線。第三道防線在名山火燒橋高地構築陣地佈防。

(五) 一三六師師長伍培英指揮四〇六團（團長劉凱聞）及劉文虎團在西昌注視賀國光的軍事行動。

(六) 一三七師師長劉元璋指揮四一〇團，（團長朱食呼）在洪雅要地佈防，阻擊胡宗南從清江、丹稜來的襲擊。該師四〇九團（團長黃以仁）作為預備隊去雅安待命。

(七) 任命副參謀長蕭天才兼游擊司令，指揮所部及四〇七團第二營駐雅安草坦、竹菁關一帶，與洪雅、名山各地部隊聯絡。

(八) 西康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王靖宇所屬三個保安團，除冕寧王鳳崗營，不能集中外，劉俊先團、劉功勛團、王德全團分別在天全、蘆山、雅安、榮經集中，維持地方治安，必要時與王靖宇協商，由劉元瑄統一指揮，作為二十四軍預備隊。

(九) 康定行營二十四軍師長唐英，指揮團長兼巴安區司令傅德銓、警衛團長王玉崗，注視火炮山方向，嚴密防守。

(十) 一三七師四〇九團和直屬工兵營、通信營、特務營等部，均為二十四軍預備隊。工兵營長劉濟民指揮該營負責雅安城防治安。

(十一) 派軍參謀處中校參謀張文翰率兵一連，到眉山思濠鎮將公路石橋炸毀。

胡部進攻劉軍撤退

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起義後，他們佈置於各地的起義部隊與在川的國民黨部隊處於對峙和戰備狀態。彭縣處於三面包圍中，右側的什邡一帶孫元良的十六兵團和楊森的第二十軍，左側的郫縣一帶是羅廣文的十五兵團和陳克非的二十兵團的包圍之中。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晚，胡宗南部第三軍以優勢兵力向駐成都武侯祠的二十四軍一個營進攻，該營因聚集懸殊、裝備陳舊、士兵的素質又差，無論怎樣鼓勁也無濟於事，盡管抵抗至天明，除部份傷亡外，其餘全部被俘。在此前天，胡宗南部已在西昌向二十四軍一三六師發動進攻，使該師死傷官兵三百餘人，師長伍培英（劉文輝女婿）只好用撤退的辦法保存下來。

十二月十四日的深夜，胡宗南部隊襲擊了劉文輝成都新玉紗街的住宅，抄了劉文輝的家，同時在埋上了大量炸藥和雷管後撤退，企圖炸掉劉文輝這個隱患。胡部撤出後，因有人進去觸發了雷管，三幢房子被炸壞兩幢，幸劉文輝當時不在成都，免遭大禍。

十二月十五日，胡宗南、王陵基部約十個團沿成雅公路向西南方向進軍，二十四軍駐雙流、新津、邛崃部隊只好相繼轉入到公路兩側進行迂迴活動，生怕遭胡宗南和王陵基部隊的襲擊。

十二月十六日，胡宗南急電第二十兵團司令陳克非：「請你馬上準備，負責在明天拂曉前解決鄧錫侯的部隊」；同時又命第十五兵團司令羅廣文，要他指揮十五、二十兩個兵團向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駐成都、彭縣、灌縣的部隊進

攻，企圖一舉消滅。

十二月十七日，王陵基和胡宗南配合行動，採取分兵兩路，王陵基以三個保安團從彭山縣、丹棱、蒲江、洪雅方向向劉文輝部發起進攻。當時在洪雅的劉文輝二十四軍僅剩一個團，佔領城北高地進行激戰，劉元璋師長見情況不妙，感到吃緊，實在頂不住了，於是他急電雅安劉元璋代軍長請求增援。劉文輝接到急電後，命令四〇九團連夜由雅安出發，向洪雅增援，才穩住陣勢。

在邛崃、名山公路沿線的劉文輝二十四軍陳明團第二營，受胡宗南部攻擊後，因陳團抵擋不了，奉命撤回邛崃；胡宗南占領雙流。胡宗南和王陵基為迅速打通成雅公路沿線，又以四個保安團向劉文輝駐邛崃的陳團進攻，由於胡宗南、王陵基所部的壓境，陳團根本無力抵抗，只是忙於撤退。由於在忙亂中反而忘掉了預先的作戰方案，根本不顧不上炸掉南河大橋；為此胡宗南部隊連夜過橋，逼劉文輝的陳團、毛團向第三線轉移。

爭取賀國光的失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也就是劉文輝起義後的第二天清晨，賀國光的態度一直使各方捉摸不透。但在這以前，曾秘談過投共的事，認為他不是被蔣中正信任派到西昌來的；重慶被共軍佔領，賀曾派人到中共二野接洽劉文輝起義通電傳到西昌後，賀派參謀長程冠珊與中委會秘書長曹良璧聯，表示願意與伍培英聯名通電響應。並請孫子汶向伍培英轉達。當日劉文輝派他的女婿伍

培英帶上隨身警衛，到賀國光的司令部望遠室親自交了一封劉文輝給賀國光的電報。其電文是：

「時局急轉直下，望兄有以自處」，賀國光明明白白知道劉文輝勸他也要投靠中共。當時賀國光為了應付劉文輝給他的電報，他對伍培英說：「我給令岳是早就有話的」，立即親筆擬了一個電稿交伍培英請他轉交劉文輝，其電文是：「弟守經行權，惟兄馬首是瞻」，並對伍培英說：「請把我親擬復電的至誠和迫切之情轉達令岳」。伍培英看了賀國光的電文，完全認為賀國光是真心實意的要投共了；後來賀國光又向伍培英說：「這麼大個事情，我必須跟自己的部屬和本地的有關各處商量一下，大家一致行動才好，你說不是？你也給我參謀、參謀！」當伍培英糊裡糊塗地離開望遠室，回到一三六師後，那知賀國光立即密令其警衛團長邱蕊川和胡宗南空運來西昌的朱光祖團進入一級戰備狀態。

在伍培英策動賀國光投共失敗後，伍培英認為賀國光為人狡猾，也要給點顏色給賀國光看看。於是雙方在各自的防區掘壕設防構築工事，封鎖交通。積極調軍遣將準備戰鬥姿態。

由於伍培英與賀國光的矛盾公開化，對長期深受災難的西昌人來說真是滿城人心惶惶，生怕兩軍一旦發生戰爭，老百姓將面臨一場戰爭的摧殘，以及西昌的文化古蹟將遭毀滅。為此，西昌廣大民衆及各界人士殷切要求調停談判，和平解決這一爭端。在民衆的要求下，組成西昌各界人士調停代表團，以寧屬靖邊司令部代司令孫仿、保安司令王子先和西昌縣參議會議長劉在田、文

教界人士劉芷汀、工商界人士徐仲偉、程源澄等人赴賀國光司令部望遠室進行和平談判，同時提出兩條建議：

(一)要求雙方停止對峙局面，以西昌和寧屬民衆利益為重，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和平解決爭端，是西昌民衆的強烈願望。

(二)如果兩軍和平談判不成，要求雙方不在城區及距城十五里內交戰，雙方退出城時不追不擊，以免在城區發生戰爭。

賀國光聽了上述兩條建議後，坦然地對大家說：「我不忍傷害城區老百姓的生命財產，不願毀壞西昌的文化古蹟，願各界人士代表團在兩方之間進行調停談判，找出緩解辦法」。我是贊成的。

兩軍對峙伍部敗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十二日，賀國光又進一步加強軍事部署，以警備團兩個營控制望遠室，北塔寺、滴水岩、北街、府街及北、東南等三城樓，監視伍培英部隊的行動；又以警衛團一個連，控制西昌汽車站的運輸車輛，以備追擊伍培英部隊，看來戰爭即將發生。

朱光祖團為外線配備，一營控制小廟機場，封鎖公路沿線，阻擊南下的伍培英部。

伍培英為表現他不示弱，也針對賀國光的軍事部署作了對峙陣勢；即令四〇七團沿老西門至雞心石小學一線佈防與賀國光司令部望遠室對峙；四〇六團和師直屬部隊佈防於倉街、十字街、雙槐樹、道溝、黃家巷、大考棚一線，保障部隊

退路通道，並側重集中炮火於師部和老西門瞞準望遠室、北塔寺；令李格新、李廣惠兩個營抵馬道子待命。

十二月十三日中午，賀國光佈防在瑤山，南河一線的警備團二營，由東門調進城內，以軍事優勢，恐嚇伍培英部隊出城，而消滅之。在賀國光強大軍事壓力之下，伍培英的軍事力量顯然不及賀國光，便決定將部隊撤至瀘沽。在撤退中遭到賀國光和朱光祖部隊的追擊；追擊中，劉文輝一三六師四〇六團兩個連被繳械，一三六師師直屬部隊戰鬥隊形被衝垮，所帶馬馱、輜重行李，大部份丟失，電訊指揮中心中斷，各連隊處於各自為戰的混亂局面。伍部在與朱光祖的交戰中，黃少銘連被繳械；在撤退中，伍部在富林一帶阻擊，經過十多天的激戰，八百餘官兵，死傷三百餘人，其中少將高參薛奉元、團長劉文虎都戰死。伍培英認為，如果再打下去，可能全軍覆沒，只好放棄富林，退守大相嶺，與共軍會合。

中共徹底整編劉軍

劉文輝二十四軍起義後，中共認為，二十四軍畢竟是一支舊軍隊，必須進行改造。一九五〇年二月，中共第六十二軍進駐西康，接管了劉文輝二十四軍的防線，將二十四軍集中於雅安，隸屬中共西康軍區指揮。不久又將二十四軍命令開赴大邑整編，與六十二軍合併，取消了二十四軍及所屬部隊番號，由兩個軍及軍事代表團等十三人組成整編委員會，中共六十二軍軍長劉忠為主任，二十四軍代軍長劉元瑄為副主任，整編方案

是：二十四軍一三六師的師團營連與中共六十二軍獨立一師的師團營連合編；二十四軍一三七師按同樣方式與六十二軍直屬部隊及一八六師合編；二十四軍的六個直屬營，編入中共六十二軍直屬部隊及一八六師。整編後的二十四軍不保留建制，徹底改造，編入中共軍隊的序列。這種方法，按當時任川北行署政委的胡耀邦稱之為「牛肉泡饅」的溶編方式。整編後，劉元瑄任六十二軍副軍長、西康軍區副司令員；伍培英任六十二軍獨立一師師長；劉元琮任六十二軍一八六師師長；楊家楨任軍大眉山分校副校長。其他原二十四軍各級長官，依據本人的表現及年齡、身體狀況，有的留任團長、副團長、正副營長等職，有的到軍事學校學習，有的轉到地方部門就業。

原劉文輝在西康共有五個保安司令部，另有一個直屬團，分別為雅屬區保安司令鄒善成、寧屬區保安司令王珍、康屬區保安司令金桂九，康南、康北區保安司令分別由二十四軍駐康南的團長，傅德銓和康北區專員范昌之兼任，保安任務也由二十四軍駐康南和康北的部隊負責。

中共六十二軍進駐西康後，保安部隊也大都集結到雅安接受共軍整編。

開展戒煙掃除惡習

劉文輝二十四軍許多年來與鴉片結下了不解之緣，這是人所週知的事。雖然劉文輝起義了，但他也知道，共軍是絕對不允許惡習帶入他們的軍隊的，應當想到共軍首先就是要禁煙。劉文輝起義後，為了爭取表現，首先宣佈自己禁煙，隨

後師長劉元琮也跟著宣佈禁煙，這對起義部隊禁煙有較大的影響。

接著共軍就抓住了劉文輝和劉元琮宣佈禁煙進行大肆宣傳，說：「要當解放軍就不能吸大煙」，接著就以營、連為單位，將吸毒者集中起來戒煙，規定紀律，不准外出。經過兩個多月的戒煙，終於使一批吞雲吐霧的「癮君子」，改掉了惡習。

跟中共走抑鬱終老

劉文輝的二十四軍組建於北伐時期，經歷了二十多年。劉文輝從抓槍桿子開始，就有一個指導思想：軍隊必須忠於他。劉文輝經過連年軍閥混戰，迅速擴編隊伍。因劉文輝為了培養忠於他的軍隊，辦了許多學校，按他的標準培養和提拔各級軍官，就連連級以上的軍官都要由他選拔任命。所以連以上接到委任狀後，幾天內須到劉文輝那裡去「謝委」；劉文輝勉勵後，即寫張條子，賞給新任軍官手槍和白洋，官越大，賞賜越多。通過這種形式和方法，以加深對劉文輝的依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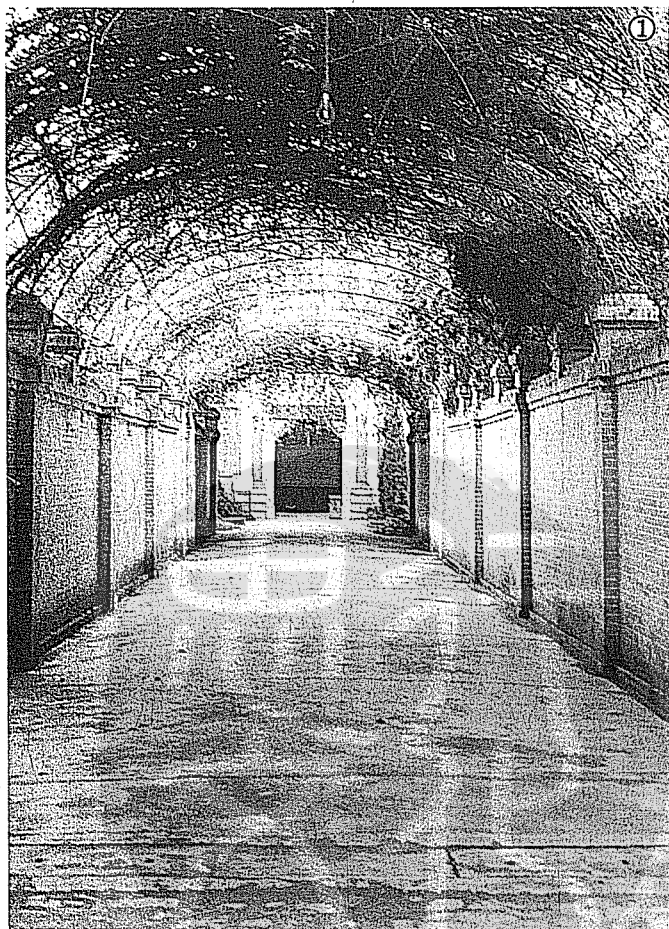
劉文輝的部隊有他們複雜的人事關係網，他的部隊之所以能維持二十多年，沒有在軍閥混戰中瓦解，就是靠他的關係網統轄軍隊，渡過重重難關，歸納起來有如下四條關係網：一是家族關係：掌握軍權的高級軍官，常用劉氏家族忠於劉文輝的人。二是親屬關係。在高中級、初級軍官中，不少是與劉有親戚、裙帶關係的人。三是師生關係。劉文輝在成都辦軍官學校，自任校長

；他同受過訓練的軍官們之間是長官與部屬，又是老師與學生的關。四是同鄉關係。劉軍素有「十圍九大邑」之稱，團長多為劉的大邑同鄉及鄰縣邛崃、崇慶等地人。此外，劉文輝保定軍校多數同學以及間接的親友關係，在他的部隊當官的也為數不少。

劉文輝通過這一層層的關係網，培植親信，

在其部隊中實行家長式的統治。劉文輝投共後，中共針對劉文輝二十四軍的特點，制定了整軍和教育計劃。中共首先宣傳中共軍隊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強調中共軍隊必須忠於人民，忠於中共，忠於人民是空洞不實在的口號，忠於中共毛澤東集權專政，則是最重要的任務。這與劉文輝的建軍思想完全背道而馳的。

由於中共軍隊在劉文輝二十四軍合編後的引導、感化下，不少軍官檢討了自己，轉向中立立場，大多數軍官開始從效忠劉文輝個人轉變為跟著中共，走效忠毛澤東，並沒有過一天好日子，劉文輝的一切都變為空無所有，劉文輝抑鬱終老，死於北京。伍培英，劉元琮的結局，更較為悲慘。



① 四川大邑劉文輝故居大門。

② 一九五〇年中共在雅安收編劉文輝部隊時的情景。

